

渔业经济政策调研文稿选编

第三辑

农业部水产司编

1083
.3

目 录

论创建渔区经济学	金 乐 (1)
浅谈经营思想与郊区渔业生产发展	黄秀珍 (6)
我国海洋捕捞业的现状与未来	吴万夫 张光华 (10)
东海区海洋捕捞作业调整与资源利用问题的探讨	孙水根 张秋华 (19)
辽宁省近海对虾放流增殖效果和有关政策的探讨	李生志 于深礼 (24)
白洋淀开发前景与建议	孟宪德 王永贵 张玉兰 周启才 吴万夫 (38)
白洋淀考察报告	杨立邦 朱松泉 黄祥祺 (41)
探索新的发展之路——山东省水产三资企业的调查	李健华 (44)
关于加强“两岸”渔业经济技术合作的初步构想	王强华 (51)
菲律宾圣保罗湖网箱养鱼考察	胡宝同 (55)
台湾的渔业及其兴渔政策	李学林 (57)
青岛市海洋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难点和出路对策	刘世禄等 (61)
北京市水产品加工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凌熙和 李玉民 (68)
关于北京市淡水养鱼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今后对策的探讨	北京市渔业经济研究会 (72)
山区流水养鱼可行性的探讨	段广垠 (76)
以船核算体制研究	俞锡棠 (79)
关于海洋渔业的双层经营问题	古竹生 (89)
从群众渔业的生产经营变化探讨国营海洋捕捞业的改革调整方向	张秋华 孙水根 (94)
完善渔业经营体制、促进渔区经济发展 ——象山县城东门渔村完善渔业责任制试点情况	林信元 张庭耀等 (98)
加强乡村渔业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水产商品经济发展	段自甫 (104)
渔业承包亟待完善——沈阳市渔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调查	朱君舜 (106)
开展服务工作, 促进渔业发展——苏家坨乡畜牧水产公司开展服务工作的调查	梁厚年 (110)
深化体制改革 壮大集体经济——佳木斯市郊区集体渔场的调查	马苏龙 (113)
华田渔场采取五统一的办法加强集中服务	徐鸿初 (116)
琼港镇四统一大包干渔业责任制的做法与效果	常堂付 (118)
挖掘潜力增效益 深化改革促发展	钱志林 关锐捷 鲁乃君 (120)
完善双层经营 促进渔业发展	关锐捷 鲁乃君 (124)
禄口镇强化服务为渔业增强后劲	赵仁宣 (127)
从胶南市渔业股份合作制的调查看股份制在渔业经济发展中的可行性	纪成进 (130)
大渔乡自力更生建设渔港的情况调查	吴树敬 王庆信 (136)

对河北省渔港现状的思考	孟光福 (138)
“以港养港”发挥渔港综合服务功能	解凤华 (140)
建立批发市场 衔接产销关系	王铁鹏 (142)
一个生机勃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关锐捷 鲁乃君 (145)
郑州市自力更生办鱼市, 建成投产四个月成交商品鱼65万公斤	段自甫 (147)
对搞活水产品流通的几点认识	张庭耀 夏 腾 (149)
关于汕尾城区水产品流通情况的调查	易 林 (153)
启动疲软中水产品市场的有效途径	陈广寿 (159)
加强市场调查适应竞争形势——谈通县水产养殖场的经验策略	沈庭栋 (161)
北京市鲜活鱼市场的现状及分析	吴湘生 (164)
正确利用个体商贩经营鲜活淡水鱼	黄 仁 (167)
对山东省寿光县蔬菜批发贸易市场的调查	庄业伦 (171)
统分结合促开发 科学管理增效益——唐海县养虾经验总结	孟光福 (175)
发展中的包头市郊区渔业	内蒙农委水产处 (177)
增产不增后劲的诸因素——湖北省国营水产养殖企业调查	王惠平 (179)
弘扬焦裕禄精神 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	
——民权县综合治理大沙河初见成效	段自甫 张占标 (190)
充分发挥大水面在渔业翻番中的增产作用	桑明强 (192)
对综合适度开发洪湖的思考	许震寰 胡传林 雷开铨等 (196)
江苏省大中型水面开发利用情况调查报告	陈良基 赵仁宣 (200)
以渔为主 综合开发 让宝湖献宝	
——洪泽湖综合开发取得显著成绩	宋福成 聂绍利 (204)
对进一步开发利用大中型水域策略问题的粗浅思考	李云生 (207)
安徽省大中型水面的综合开发对策	谈 谈 (209)
综合开发利用大中型水面	尹 平 (215)
加速浙江大中型水面渔业综合开发的步伐	邱亦令 (220)
重庆大中型水域综合开发情况调查	
——兼论大中型水域渔业发展方向	徐顺志 (227)
湖北省大中型水面渔业综合开发现状和发展对策探讨	高泽雄 (233)
山东省海水增养殖开发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	于贵运 刘世禄 栾树萱 纪成进 (238)
渤海增养殖开发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	王玉枢 (254)
天津市海水增养殖业开发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探讨	支宗伟 (260)
辽宁省关于开发“两岛一湾”浅海滩涂经济体制和有关政策的意见	
.....	梁恩东 茅绍廉 孙传运 (264)

论创建渔区经济学

金 乐

一、现实的呼唤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渔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在大农业中首屈一指，引起大众的关注。渔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仅是一个“食而有鱼”的问题，它还向我们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在世界性的食品紧缺的危机中，在中国面临耕地面积锐减、粮食产量徘徊的困扰下，我们是否存在一条既不与农业争地，又能大幅度地增加食物的战略途径？

回答是肯定的。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及其丰富的资源潜力向我们展示：日益勃兴的海水增养殖技术及其它新兴的海洋科学技术正在将上述可能性变为现实。

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一场长期而又伟大的战斗。从原始人类采拾滩涂贝类开始，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至少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漫长的数千年来，沿海人群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认识、利用大海的同时，其自身亦不断繁衍、进化。采拾贝类、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群演变成高度文明、可以现代化远洋作业的新时代渔民，相应地，简单、原始的渔猎经济演变成了复杂、文明的现代渔区。

人口爆炸、粮食危机将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推到重要地位。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向我们提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必须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对变革中的中国渔区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与透视。

改革的大潮正冲击着渔区这块镶嵌在我国沿海的特殊区域，伴随改革而产生的许多新的现象和矛盾需要我们运用综合与整体的逻辑思路从理论上给予系统的阐释和解决。

渔区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使渔区产业结构正迅速发生变化。在三大产业中，二、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在渔区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海洋渔业的比重下降。在海洋渔业内部，海水增养殖业比重大大增加，捕捞渔业比重下降。渔区经济已突破以海洋捕捞渔业为主体的单一模式，变成融渔、农、工、商、旅游、交通运输及诸种服务行业为一炉的复杂综合体。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渔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渔区消费机制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体制下的渔区居民应确立何种消费观念，确定何种消费标准，如何协调生产发展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关系，有待我们进行系统研究。

由于海洋渔业的作业特性和水产品鲜活易腐的特点，要求海洋渔业具备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就使担负此使命的渔区集镇在渔区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随着渔区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以港口为依托的渔区集镇有的发展、有的重建、有的淘汰，在新体制下，如何规划、建设、管理好渔区集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渔区的大问题。

渔区经济是农村经济与海洋经济的耦合，具有独立于农村经济的鲜明特点。渔区经济以其独特的方式运转，按照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发展。显然，渔区经济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无论是农村经济学还是海洋经济学都无法给予圆满的解决，作为部门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或渔业经济学对此更无能为力。因此，现实在呼唤着创建一门适应社会主义新型渔区发展需要的新学科……渔区经济学。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对渔区经济产生、演变、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进而对渔区、渔区经济的范畴、体系以及渔区内部结构特点、渔区新型经济体制的模型特征，有明确、本质的认识，系统而科学地阐明渔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渔区经济的形态演变

(一) **原始型渔区**。沿海地区的原始人群最早大规模地利用了我国的海洋资源，他们是开发海洋的先驱。原始人群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贝类采拾，贝类的肉是他们维持生存的主要食物。原始人长期从事贝类采拾，一是当时浅海滩涂贝类资源极为丰富，二是生产力水平低，采拾贝类是最适合当时海滨地区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活动。原始人在采拾贝类的同时还兼事渔猎和农耕，而且，随着物质生活需要的扩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渔猎和农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当他们的生产力活动由采拾贝类为主转变为以农业或捕捞为主的时候，原始型渔区经济就过度到了古代型渔区经济形态。

(二) **古代型渔区**。海洋渔船的出现是这个时期起始的标志。在渔船出现之前，渔民只能在滩涂和浅海活动，渔船出现之后，才可以进入较深的水域，捕捞游动性比较大的鱼类。海洋渔业的发展也正是在渔船出现之后才进入了新阶段。到春秋时代，海洋捕捞已广泛使用船只，《管子·禁藏篇》载：“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海也”。

在古代型渔区形态中，渔民已积累了丰富的渔业知识：经过几千年的探索，陆续开发了各海区的沿岸和近海渔场；劳动人民长期积累了海洋动、植物分类命名、生态习性、捕捞经验、加工利用等一整套知识；创造了适合本地区各种鱼的捕捞工具和方法；最迟到宋代，渔区就开始进行水产养殖了，到清代，牡蛎、蚶、鲷等鱼、贝类，已经能够进行较大面积的人工养殖。

在古代型渔区形态中，水产品已成了与内地交换的重要商品，与此相适应，渔区开始出现经销水产品的贸易和商业。

(三) **近代型渔区**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渔业进入了机轮捕鱼时代，这意味着近代型渔区经济的开端。1905年，江浙官商购入一艘德国轮驳从事拖网渔业，这是我国第一次引进新式海洋渔轮，是渔船动力化的转折点。捕捞生产的这种改革，并未取代或废除我国原有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所不同者，自渔船安装动力机器以后，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在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节省了人力，争取了时间，从而提高了渔业生产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由于渔船的动力化，渔业生产规模扩大了，有条件使捕捞生产离开近岸水域向外海和更远的水域进军。

在近代型渔区经济中，近海捕捞生产能力开始出现饱和，到后期超过资源再生能力，最后乃至酷鱼滥捕，导致主要经济鱼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产量大幅度下降。捕捞产量的增加，一靠过度捕捞幼鱼，二靠过度捕捞产卵和越冬的大黄鱼和带鱼等亲鱼，产量中经济鱼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受破坏严重的小黄鱼在吕泗洋传统渔场已形不成鱼汛。

在近代型渔区经济中，海水增养殖业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海带、紫菜、对虾等技术突破，为近海捕捞的严峻形势带来曙光。水产品保鲜加工业完成了由盐干到冷藏和制冰保鲜的历史性转变。渔需物资供应、水产品销售等服务业门类齐全。形成以海洋捕捞渔业为主体、以保鲜加工、商业、服务业为辅助、结构单一的渔区经济体系。

（四）现代型渔区

中国渔区经济正处于由近代型向现代型历史性转折时期。目前，现代型渔区经济体系的雏形已经形成。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渔区经济将完成这种转变。

现代型渔区经济具有如下特点：

1. 完善的经济结构。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城、镇、乡网络协调。近代型渔区以海洋捕捞渔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结构转变成多功能、高效、低耗的渔区经济体系。
2. 生态平衡得到恢复，酷鱼滥捕现象得到制止，渔区自然环境得到治理和净化。
3. 生产手段现代化，渔区居民生活现代化。在这一时期，远洋和近海捕捞渔业、海水增养殖业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的主角；现代水产保鲜加工技术将得到充分发展；在渔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失，渔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与此相适应，渔民文化、教育水平将接近或达到附近城镇水平。

三、渔区的概念

科学地确定“渔区”这一范畴的规定性和定义，然后才能引申出“渔区经济”的范畴和定义，进而才能深入地探讨渔区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

有四种提法：

1. 渔区是从事海洋渔业生产和沿海渔民聚居的地方。
2. 渔区是一个经济生活的整体，渔区经济生活在各个方面具有独立活动的性能。
3. 渔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
4. 渔区是具有一定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特征和职能的地区综合体。

以上四种提法，它们的内容和含义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种概念只指出了渔区的核心是海洋渔业生产和渔民的聚居地。

第二种概念扩大了内容，除了海洋渔业以外，还包括着渔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旅游及服务行业等渔区中的其它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把渔区当作了一个综合的经济实体。

第三种概念认为渔区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包括着经济，而且包括经济以外的政治、军事、文教和习俗等渔区中的所有运动。

第四种概念除了包括整个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以外，还包括了空间因素，即自然环境的立体因素。

纵观整个渔区系统，它由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渔村细胞所组成。按地域特征，渔村又分为“海岛型”和“陆岸型”两大类，前者孤悬海外，后者位居腹地，共同构成多姿多彩的渔区系统。

因此，渔区的概念可简述为：渔区是一个区域性概念，它由各具特点的众多的渔村细胞构成，是一定的空间结构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的统一体。

四、渔区经济的概念

通过对渔区形态演变及其内涵、外延的考察，我们对渔区概念有了一个立体的把握。渔区经济系统与渔区政治系统、文化系统、意识系统、生态系统混为一体构成渔区系统。其中，经济系统作为渔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渔区系统的平衡、稳定、协调、演化起着规定性作用。但渔区经济的发展也受渔区政治、文化、意识、生态各个系统的制约，如果其中有的系统功能配合形成障碍，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就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渔区经济，就是在渔区这个特定的地域中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体，它包含着—个庞大的、相互关联的多维性结构系统。

作为一个经常过程系统来说，它包含着经济控制子系统和经济执行子系统。前者又包括政策、计划、指令、措施、经济杠杆等要素；后者又包含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控制系统通过各种要素对后者的输入进行监测，对后者的流程进行调节，以期达到预期的目标。执行子系统的自身经济循环的输出反馈给控制子系统，以校正或补充控制行为。

作为经济形态系统来说，渔区经济系统可以看成是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有机统一体。它包含国家所有制（国营海洋渔业公司、工矿企业、服务业），集体所有制（旧时集体经济及“大包干”形式），股份所有制及私人所有制（如各种以船核算制捕捞企业），目前，渔区经济中股份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占有较大比重，成为渔区经济有别于其它经济的一大特色。

作为经济部门系统来说，渔区经济又包括渔区渔业和农业（含海洋捕捞业、海水增养殖业及少量农副业等），渔区工业（含水产品保鲜加工业、饲料工业、渔船及渔业机械仪器制造业、拆船业及部分城市扩散工业等），渔区商业（含生产资料供应、水产品销售、渔区居民日用品零售、批发商业及其它工农产品购销等），渔区旅游服务业（含日常生活、饮食服务、金融、保险、信息服务和观光旅游）等产业，形成以渔业为基础，以渔区工业为主导，以渔区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为组带的渔区产业结构。

作为经济资源系统来说，渔区经济还包括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两个子系统。前者如水面、土地、能源、气候等要素；后者如劳动力、劳动工具、资金、技术、教育、管理等等要素。水面、土地、气候等自然要素形成渔区生态系统。劳动力和劳动资料（或工具）结成渔区生产资料系统。渔区生态系统和渔区生产资料系统形成渔区生产力实体系统。技术、教育、管理等要素使生产力实体得以运转和合理组织，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综合以上各个侧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渔区经济是一个多维网状结构。它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流程三个维向。经济部门结构，属于生产力的布局；经济资源结构，属于生产力的要素；经济形式，即为生产关系。整个渔区经济系统，按照经济流程结构周而复如地循环运动；生产力，是这种循环运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生产关系，则为生产力运动的形式。这样，就构成一个“内容……形式……过程”溶为一体的完整运行结构。

五、渔区经济学的对象与任务

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

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有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一门科学的对象”。* 这是说，由矛盾的特殊性，构成科学研究对象区分的基础。这只是指构成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不是说每一个具有矛盾特殊性的经济现象，都会立即成为现实的一门科学。

一种经济现象，只有当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具有自身独立于其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时，才会在现实上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前面我们已比较明晰地廓划了渔区与渔区经济系统范畴，说明了渔区经济系统的特有结构与功能。可见，渔区经济系统不仅具有其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已经形成了可以独立于其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它完全可以成为而且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

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渔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渔区经济这个特定地域经济的内部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或者说，中国渔区经济学，是研究中国渔区经济系统的总体运动规律，并从中探索最佳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科学。

这个对象定义说明：渔区经济学，要研究中国渔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矛盾运动，研究中国渔区经济系统结构的最优化组合，以获得最大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需研究中国渔区经济系统同外部环境（渔区、海洋、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约束关系，一方面探索最佳的系统适应性，一方面研究改造环境条件的可能性；要研究中国渔区经济的发展前景，研究中国渔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等。

六、渔区经济学与渔业经济学

经济的发展，愈来愈趋于综合配套、交叉渗透。三大产业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在不同的地域，这种综合交叉又表现为不同的规律性。在渔区经济领域，各产业部门的结构、组合方式和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个性，它有别于农村经济，更不同于城市经济，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地域经济学——渔区经济学。

渔业经济学是研究渔业这一特殊物质生产部门运动规律的学科。而渔业又包括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两大类，因此，对海洋渔业的研究自然是渔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渔区经济学与渔业经济学具有相通之处。前者从渔区的角度将海洋渔业置于渔区三大产业中进行研究，后者从整个渔业的角度，将海洋渔业置于渔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这个大系统中进行探讨。

渔业经济学不能取代渔区经济学，相反，后者也无法取代前者。具体地说，渔业经济学是研究渔业这一部门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合理化问题，渔区经济学则是研究渔区这个地域的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合理化问题；渔业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渔业内部（包括海洋渔业与淡水渔业）的经济问题，渔区经济学则是从海洋渔业同渔区其它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合理结构的角来研究渔业；渔业经济学以纵向分析为主，渔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以横向综合为主。因此，渔区经济学与渔业经济学具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

作者单位：中国水产科学院
渔业经济研究所

*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79页

浅谈经营思想与郊区渔业生产发展

黄秀珍

北京市水产体制改革后，郊区淡水渔业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九〇年全市养鱼水面33.9万亩，总产量5108.3万公斤，比一九八五年增长2倍多。自一九八四年以来连续七年每年递增500万公斤以上。市场鲜活鱼明显增多，年人均占有自产淡水鱼从一九八五年的1.6公斤，提高到一九九〇年的5.1公斤，价格稳中有降。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各方面因素影响，现在淡水渔业产销都出现一些困难。特别是“养鱼难”、“卖鱼难”的矛盾比较突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新的矛盾的产生预示着新的进步的开始。

认真研究北京市淡水渔业发展战略，关系到本市水产业的前途发展，现就经营思想与郊区渔业生产发展谈几点看法。

一、渔场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是客观需要

当前出现“两难”究其原因，“养鱼难”主要是渔业物资、饲料价格上涨，成本加大，企业资金紧张，多数渔场靠贷款负债经营，无力更新改造旧鱼塘。“卖鱼难”的焦点在捕捞汛期，大量鲜活鱼出塘，销不出去，资金收不回来，直接影响来年再生产。“养鱼难”与“卖鱼难”是淡水渔业生产与经营、生产与流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某些不相适应的表现，限制和制约了生产的发展。解决矛盾的关键是企业转轨变型，即从过去的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

从大的经济环境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搞的是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品经济模式，国家用包罗万象的计划总揽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并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改革的浪潮掀起，农村在改革中率先突破了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种什么养什么都要靠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作法。随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转化。渔业企业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势在必行，大势所趋。

从企业自身来看，北京市淡水鱼价格放开前，郊区社队渔场只管按计划养鱼，汛期捕捞季节，国营水产部门投入大量人力、运力，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购销价格倒挂，经营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一九八五年前全北京市年水产品上市量几千万公斤，每年用于购销流通补贴几千万元。渔场无需考虑鱼的销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单纯生产型。北京市淡水鱼是在首都“吃鱼难”的情况下放开的。过去商品很缺乏，企业不用担心鱼品的销路。前几年逢年过节，用户要到渔场上门买鱼，有时甚至要局长、场长批条子，可谓“皇帝女儿不愁嫁”。在全市产量不高，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生产者鱼品销售不成问题。中央1985年3月下发了《关于放宽政策加快发展水产业的指示》及市政府对郊区渔业生产的发展制定了具

体政策，养鱼水面不断扩大，鲜活鱼产量逐年提高。自一九八四年五月本市淡水鱼价格放开后，水产部门取消财政补贴，国营水产品流通单位和商业企业没有对淡水鱼的统购包销任务，渔场生产的产品作为商品参加社会商品大流通，同样受到市场、价格、价值规律的制约，生产产品的企业同样要接受客观经济规律的“考验”。加之近几年淡水鲜活鱼供求矛盾的缓解，某些商品从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过渡，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提高商品意识，加强市场观念，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产品的销路、市场、产品成本、企业管理、核算列入日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营。企业既要抓鱼品的产量，又要抓鱼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向社会提供更多适销对路的商品；既要注重企业的投入，又要注重产出，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因此渔场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解决“两难”，促进淡水养鱼发展的关键。

二、树立新的经营思想，新的生产发展观念

经营思想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思想。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产生和发展，并指导着一定时期内的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等一系列经销活动。

当前郊区生产单位存在着两种经营思想，一是最早形成的旧经营思想，表现形式为生产者以生产为重点，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单纯追求产量的提高，不论是产品的数量还是品种，都不考虑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一部份渔场、生产单位存在着养鱼靠自己、卖鱼靠上级的思想。市场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就不知所措，找政府找上级；亏了钱等政府，赚了钱就花完，只看重眼前利益，而对于生产设备更新、旧池改造等没有长远打算。这种经营思想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不相适应，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

另一种是新的经营思想。新的经营思想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为重点，面向市场，运用市场推动经济发展，运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组织生产，消费者需求什么，生产什么；需要多少，生产多少，生产和销售只是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手段。广泛运用调查和预测的手段，以确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要。新的经营思想与旧的经营思想在经营销售活动的重点、经营活动销售的手段和经营销售活动的策略有着本质的区别。新的经营思想不仅注意近期利润、局部利益，更注意长远的大局的利益，注重事业的发展。

人是经济改革的主体，是企业经营的实施者，提高主体认识能力是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条件。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关键是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树立新的经营思想，按新的经营思想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几年来京郊有些渔场生产发展较快，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边看着渔场，一边盯着市场。以产量居全市各区县之首的顺义县分析，多数渔场结合企业条件，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的品种、规格、数量，一手抓生产，一手抓销售，一九九〇年总产量962.6万公斤，占全市总产量19%。商品流向构成大致是：横向联合机关厂矿事业单位投资建基地定向销售530万公斤，占该县总产量的35%，销往县内乡镇企业150万公斤，占总产量15%，销售个体商贩40%，年底存塘100万公斤，占总产量10%。以新的经营思想，指导渔场的经济活动。

“手”、“眼”并用，有计划有目标安排生产，即使在淡水鱼流通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生产经营呈良性循环，产量逐年稳步发展，企业效益较好。

在新的经营思想确立的同时，还要有新的生产发展观，才能指导企业沿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过去我们靠扩大水面、提高单产、增加产量、根据首都整体规划、土地利用、生态平衡等诸多因素，今后再大面积挖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的着眼点在内涵的发展。衡量生产发展的标准，不仅仅是产量的提高，重要的标准是上市商品量，是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水平。生产的产品是否是人民需求的品种规格。生产产量再高，产品的品种、规格不畅销对路，鱼卖不出去，也不能表明生产发展了。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需要我们的思想有新的飞跃，观念要更新，要重视质的提高，满足人民需求程度的提高。

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效益的提高，没有效益的生产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商品生产，产销两旺，企业效益提高才是我们所期望的生产发展的景象。

确立新的经营思想，树立新的生产发展观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过程时间越短，我们的事业发展越快。

三、关于促进郊区渔业生产发展的几点建议

1. 增强商品意识，以销促产

新的经营思想的核心是按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生产，发展生产。渔场安排生产时，首先想销路在哪里，市场上缺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想到养的鱼是商品，要卖得出去。特别是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要以销促产。鱼销不出去，资金收不回来，社会再生产无法进行，企业不能生存。把销售放在重要位置，并不意味着每个渔场职工都去站柜台卖鱼，而在于要有强烈的市场观念，首先想到的不是每条鱼养到多大，增加多少产量，而是什么时间、养多大市场需要。

2. 安排放养品种，调整产品结构，轮补轮放，均衡上市

发挥北京科技优势，利用先进设备，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上市时间，克服以往本市淡水鱼市场春少、冬紧、夏季缺、秋季上市堆满街，缓解“卖鱼难”。

3. 吸收联营资金、基地建设投资，扩大产销直挂

市政府对郊区渔业生产的重视和领导是淡水养鱼生产发展的保证。历年都有一定额度的支农资金扶持生产，但从总体上看资金是短缺的。吸收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共建副食品基地，既增加了渔场资金，缓解养鱼难，又增加了生产产品的目标，减少商品流转环节，减轻生产企业的压力。

4. 实行企业化核算管理，提高渔场适应能力

企业素质是贯彻新经营思想的内在条件。渔场要增强企业意识，实行企业化管理，对企业的人、财、物进行科学管理，独立核算，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完善。克服小农经济意识，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姿态自立于商品市场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5. 加强渔业投资管理，建立渔业风险基金

水产品是放开商品，但放开不等于不管。相反由于一些商品放开后，计划经济多年形成的市场体系、经营思想，使得生产者、经营者一下子难以适应风云变幻的市场。市场更需要

宏观管理，新的流通体制逐步形成，运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组织生产，以避免完全市场经济造成的生产盲目性。加强渔业投资管理，财政部门采取倾斜政策扶持渔业生产主管部门建立渔业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可以国家拨转，生产经营企业提留等形式，逐年积累，以应付市场出现的特殊变化，或用于建设批发市场。一则使生产经营单位树立长远发展观念；二则增强主管部门调控市场的能力。

总之促进郊区渔业生产首先要树立新的经营思想，同时辅以得力的政策措施，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宏观指导，建立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流通体制。

需要提及的是主管单位、主管部门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销售多大比重的鱼品，而在于对市场流通的指导作用和宏观管理能力。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发挥企业的优势和特色，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一个“多渠道少环节”，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及其运行机制。从目前情况看，城乡结合部建立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是拓宽流通渠道，解决淡水鱼生产与上市之间的“肠梗阻”问题的有效措施。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发展郊区淡水渔业生产，有利于首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北京市水产总公司业务处

我国海洋捕捞业的现状与未来

吴万夫 张光华

一、海洋捕捞渔获物在水中的比重

我国是世界海洋捕捞大国之一。按1987年统计，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为438.1万吨，约占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的6%，仅次于日本、苏联，而居第三位。

1990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551万吨，比1980年的281.3万吨，增加95.8%。海洋捕捞产品在全国水产品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1990年为44.5%，比1980年的62.5%下降18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尽管海洋捕捞产品在全国水产品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绝对产量仍在继续上升，1990年比1980年，平均年递增为6.9%（表1）。

表1 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及比重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公斤/人

年 份	海洋捕捞产量	在总产量的比重	人均占有量
1950	53.6	58.7	0.97
1960	174.9	61.5	2.65
1970	209.7	65.8	2.52
1980	281.3	62.5	2.84
1985	348.5	49.4	3.31
1990	551.0	44.5	4.80

从表1中可以看出，尽管近10年来我国的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业发展迅速，在全国水产品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与日俱增，海洋捕捞产量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是，我国目前水产品的构成中仍保持以海洋捕捞为主体的格局。海洋捕捞在我国水产品生产的四大领域（即：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淡水捕捞、淡水养殖）中，仍居首要地位。

二、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历史及现状评价

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发展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一) 发展速度呈现“S”形

40年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49~1972年，为逐步增长时期；1973~1983年，为产量徘徊时期；1984年至现在，为高速增长时期。这种发展状况，既与国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相一致，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还比较丰富，而且当时的捕捞能力不足，故海洋捕捞处于一个逐步增长时期。而在七十年代前后，无论是经济体制、生产结构，都不利于捕捞生产，过量的捕捞能力挤在近海，使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以致生产徘徊不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体制的重大变革、生产结构的初步调整、特别是鱼价的逐步放开而具有的经济上的特殊引力，使生产要素超常规地投入，渔获量大幅度上升。按照“S”形的发展趋势，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二) 渔获质量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渔获物的种类来看，我国传统的“四大经济种类”产量，无论在海捕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绝对渔获量，都在明显的下降。大黄鱼，已从最高年产量19.6万吨(1967年)下降到1.90万吨(1989年)；小黄鱼最高年产量16.3万吨(1957年)，下降到1.70万吨(1989年)；带鱼最高年产量57万吨(1974年)，下降到41.6万吨(1989年)；墨鱼最高年产9万吨，1989年为5.7万吨(见表2)。

表2 四大经济鱼类年产量及在海捕总产量中的比重变化

年份	海洋捕捞总产量(万吨)	四大经济鱼类		分类产量			
		合计(万吨)	占海捕总产量%	大黄鱼	小黄鱼	带鱼	墨鱼
1960	174.9	53.9	30.8	6.6	13.6	28.0	5.7
1970	209.7	63.7	30.3	15.8	3.0	39.1	5.6
1980	281.3	67.5	23.9	8.6	3.6	47.3	7.9
1985	348.5	56.7	16.2	2.6	3.0	45.8	5.3
1988	463.3	48.1	10.3	1.8	2.4	36.6	7.3
1989	503.6	50.9	10.1	1.9	1.7	41.6	5.7
1990	551.0						

按照世界食用性鱼类的消费尺度来衡量，我国海洋捕捞产品质量大都处在二、三类水平上。国际水产品贸易中，95%以上属于海洋捕捞产品，而我国水产品出口中，海洋捕捞产品仅占1/3左右(1986年)。

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无疑对改善海洋捕捞产品的质量结构产生着新的作用。1990年远

洋捕捞产量17.9万吨，能够运回供应国内市场的为6.4万吨。

（三）实际消费状况分析

我国海洋捕捞产品虽然对人口来讲，人平占有量低，但食用率却比较高。这种占有量水平低而食用率水平高的状况，既与我国渔获物缺少适宜做鱼粉的大宗种类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我国海洋捕捞产品的严重短缺，很难从渔获物中抽出更大份额用于非食用。同时，能够使用这样多的渔获物投入食用，也是与我国近几年水产品加工业，特别是海上第一线保鲜不断得到加强分不开的。

（四）资源开发合理度的分析

按水域划分，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仍有80%来自近海，而外海及远洋仅占20%（1990年）。也就是说，来自近海的产量约444万吨。国内海洋捕捞权威专家们认为，我国渤、黄、东、南四海区的经济种类资源量为489~572万吨，按最大持续产量占资源量50%的原则推算，可捕量应为245~286万吨。但目前现实，在近海的渔获量已超过了55%至81%。然而，如此严重的过度捕捞并未引起1990年的减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70~80年代我国渔获对象的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捕食者地位的第四层次的传统经济种类因过度捕捞资源衰退，捕食者的锐减而导致被捕食者的增多。这就是说，第三层次的渔业资源正在逐步取代第四层次的渔业资源。如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海洋渔获物将更加向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化发展，能够用作食用的资源将越来越减少。产量的增长已为质量的下降所抵销。另一方面，从整体来看，资源正在衰退，从局部来看，某些渔场还有一定的资源潜力，需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去开发。远洋及中深海资源也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利用。

三、趋势预测与目标分析

（一）90年代我国海洋捕捞业将出现下列趋势：

1. 作业结构调整仍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超负荷的捕捞强度难以抑制，而且还因为海洋捕捞产品的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经济利益的原则将驱使人们继续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2.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潜力资源将得到开发（见表3）。

表3

可望进一步开发的潜力资源可捕量

单位：万吨

水 域	东 黄 海	东海外海	南海北部 外 海	南海南部 西沙群岛	远洋渔业
可捕量潜力	45(鳀鱼)	10	8	10~15	35

3. 从生物学角度分析，由于资源的波动周期、捕食关系及人类的干预，使各种捕捞对象分别呈现衰退、稳定及上升趋势。具体分析如下：（1）当今的新的四种主要捕捞对象中，鲐、鲷、马面鲀等三种资源有所回升，而另一种即带鱼资源仍可能下降。（2）属于第三层次的资源虾蟹类，因捕食者大黄鱼的衰落，在90年代仍将上升。（3）11种大中型经济种类中，大黄鱼、小黄鱼、墨鱼资源将继续衰退，考虑到其中马鲛资源尚好，总产量将可能略有上升。（4）低质、小型种类，90年代仍可能增长。总的来看，渔获量将呈上升趋势，但渔

获主体将继续转向第三层次资源。

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海洋捕捞比较效益的下降, 亦即渔民收入相对降低, 将有可能促使部分海洋捕捞力量向其他行业转移, 从而使海洋捕捞强度特别是近海捕捞强度得以减轻, 部分渔业资源得以保护、恢复和增殖, 但这种生产力的转移, 主要受外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约束, 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 现很难预见。

(二) 产量预测

决定海洋捕捞产量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1. 对现有资源主要是近海资源的科学管理水平; 2. 调整作业结构的决心; 3. 开发潜力资源的能力; 4. 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的程度。各种制约因素的变化及其不同组合, 将引出各种不同的结果, 并由此而产生产量预测的多种方案。根据影响产量变化的诸多因素变化的程度, 并考虑到上述描绘出来的海洋捕捞在90年代可能出现的趋势, 至2000年, 海洋捕捞产量目标的预测可以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见表4)。

表4

2000年产量目标预测

单位: 万吨

年 限	1990年实产	2000年(方案)		
		I	II	III
产 量	551	651	594	348

注: 1990年至2000年, 方案I, 年递增1.68%, 方案II为0.75%, 方案III为-0.47%。

方案I, 在1990年基础上, 预计再增加100万吨(其中远洋渔业增加35万吨, 鲷鱼增加45万吨, 海外捕捞增加10万吨, 南海中深海增加10万吨)。方案II, 也考虑到1990年的基础, 预计增加43万吨(其中东海外海及南海中深海增加20万吨, 鲷鱼等中上层鱼类增加18万吨, 远洋渔业增加20万吨, 并通过调整作业, 使近海捕捞压缩15万吨)。方案III, 从生态的良性循环和资源的最佳利用的原则出发, 考虑到专家们1979年的“紧急建议”及近10年来的生产实践及其资源潜力而提出来的。即: 近海资源可捕量220万吨(其中渤海60万吨, 东海110万吨, 南海北部50万吨), 加上可供开发的资源128万吨(其中鲷鱼50万吨, 东海外海10万吨, 南海中深海18万吨, 远洋渔业50万吨), 共348万吨。

(三) 对方案的评价

如前所述, 还可以提出更多方案, 但基本上是上述三个方案的思路了。可以有理由地认为: 方案I, 是可能成为现实的目标; 方案II, 是应该积极争取的目标; 方案III, 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具体评价如下:

方案I, 能使现有捕捞船网工具及配套设备继续运转, 使已从事海洋捕捞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就业, 并可以从海洋中索取尽可能多的水产品, 但是, 我国海洋渔业的科学技术不会有太大进步, 技术改造不会有大的进展, 劳动力素质也不可能有多大提高, 因而, 在海洋渔业的国际竞争中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从渔获物讲, 数量虽有增长, 质量将继续下降, 能够用来有效供应我国居民食物市场的品种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而且, 由于价格对若干种传统渔

获物的强刺激，将进一步促使对这些种类的酷渔滥捕，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加剧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过程，终将导致我国海洋捕捞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全面降低。

方案Ⅰ，既适于目前已经形成的捕捞格局，又符合进一步调整作业结构及开发潜力资源的精神，也符合我国目前的渔业资源管理水平。该方案虽然对保持生态平衡、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但对维持资源现状，为下个世纪彻底改变面貌，能够带来积极作用。如能进一步深化改革，科学管理，以法治渔，加强对海洋渔业的宏观调控，也可以，而且应该把方案Ⅰ作为争取实现的目标。

方案Ⅱ，虽然产量目标较低，但对恢复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近海渔业资源，实现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全面提高渔获质量，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各种机制很难改变现有的海洋渔业格局，至少在本世纪内很难实现这种方案，即算是下个世纪初，由于新种类，新渔场的开发，渔具渔法的进步，以及因资源增殖放流等重大行动而使资源全面好转，其渔获量也将突破方案Ⅱ所描绘的目标。

四、条件分析

（一）我国海洋捕捞业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1. 渔区经济体制基本理顺

随着渔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多种经济形式与经营管理形式的涌现，以及多种形式渔业生产责任制的逐步完善，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目前渔区经济体制基本理顺，渔区经济初步繁荣，生产积累得到加强，为海洋渔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2. 已具备一定的技术装备

目前我国拥有从事海洋捕捞的机动渔船24.42万多艘，924.8万马力（1990年）。从发展速度看，是十分惊人的。其机动渔船及马力数，比1980年分别增加4倍及1.8倍。这种渔船及劳力投入的总量，不仅能满足需要而且还有剩余。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探鱼导航及网具等方面的较大改进，捕捞效率还会有相应提高。由此可见，捕捞力量的投入一般地说，对今后海洋捕捞的继续发展将不会是主要矛盾。

3. 资源仍有一定潜力

主要反映在中上层鱼类，南海的中深海渔业资源、外海渔业及可供国际渔业合作的远洋渔业资源。从目前分析，今后可望从上述诸方面争取120万吨左右的渔获物（见表3）。

4. 作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就开始调整捕捞作业结构，经过10年的努力，近海底拖网及定置网作业比重有所下降，围、流、钓作业得到适当增加，中上层鱼类如鲈、鲹、鲢、远东拟沙丁鱼，以及近海虾蟹类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外海作业得到加强，在海捕产量中，1988年比1984年外海渔获物所占比重上升了2个百分点。生产性增殖放流，特别是对虾放流已形成一定规模。远洋渔业也迈开了第一步。这些，对海洋捕捞业的生态经济良性循环正在产生积极作用。

5. 市场需要，有利于渔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般地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水产品市场仍是十分广阔的。特别是海洋捕捞产品，由于资源的衡量和渔获物的有限性，其供应短缺更是不言而